

“新大众文艺丛书”： 体认自我，也共情他人

当文学不再困于书斋，当更多人开始关注市井烟火、平凡人生与劳作现场，一种新的文艺形态便有了生长的土壤。花城出版社推出的“新大众文艺丛书”，汇集了来自东莞的瑛子、章新宏、易翔、曾为民、沈汉炎、温雄珍等6位素人作者的作品。从《擦亮高楼》到《赶石头的人》，从《东莞时间》到《有些光不会消失》，不乏稚嫩写作者们，以抹布为笔，以石头为纸，以岁月为笺，把凡俗的日子写成了诗，让汗水与眼泪有了精神筋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人人皆可写作”的生动注脚。

这6位作者的身份有着鲜明的劳动者印记：保洁员、石材销售员、烧烤摊主、基层教师、体育工作者、渔村漂泊者，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也不虚构生活，而是以亲历者的姿态观察、记录、感受和思考。他们的文字，很少悬空地抒情，更多的是对生活肌理的剖析和雕刻，不追求修辞的精致、叙事的宏大，而重视经验的真切、情感的赤诚。这些来自生活现场的活潑的细节和体验，再一次证明，经验是有力量，从身体感知得来的知识有时比空泛的思想更有深度。这种从直接经验中获得的力量，对那些日渐板结的文学是一次不小的冲击。

《擦亮高楼》的作者瑛子，写繁华城市那些被忽略的人生，“擦亮高楼”时也希望能“把自己的人生擦亮”。她记录劳动的场景，比如清洗车库时，“四个人拼着往前推拖把，谁慢一点，谁快一点，拖把就不会成直线”，可她因为肥胖，“干

到半场，感觉缺氧，跑不动了”，画面并无美感可言，却充满了生命的重量。她还写灰尘如何飞扬，写工装被汗水浸湿后的颜色，这些带着呼吸、体温和细微颤抖的细节，成了折射一个群体真实生存状态的棱镜。

《赶石头的人》是石材厂工人曾为民在石屑中淬炼出的生命诗行。从背石人的汗水到工伤事故的隐痛，从夫妻分居的思念到对乡土乡情的怀想，诗人将个人经历融入诗中，让每一首诗都成为真实生活的切片。这种以物写人、以事照心的书写，呼应了“新大众文艺”的特质——不回避日子的艰辛，不夸大生存的苦难，而是在具体场景中理解个体的命运，在平凡劳作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从书里每一部作品，都带着这个个体生命的印痕。温雄珍在《在炭火安居》写烧烤摊的日常，写炭火炙烤食材的滋滋声、菜摊前的鼎沸人声，并把“在马路边，守着菜摊”看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日日亲历的日常，在她的文字里被赋予了不凡的重量。章新宏在《从江右到岭南》里写乡愁，“我将根扎进东居这片土地时，刚好是秋天。从此，我的记忆密码里便多了一个‘秋’的代号”。易翔在《东莞时间》里写纯真少年，“她觉得力气小，每道门槛都好难跨/只好陪在美好的时光，不能自拔”，也写“把头埋进试卷的少年，寻找通往未来的正确答案”，映照出基层教育者的坚守与期盼。沈汉炎在《有些光不会消失》里写漂泊与扎根，他说“一辆三轮车，就是一座移动的博物馆”，为留守的人、漂泊的人收藏希望。这些文字的动人之处，在于写作者并不冷眼旁观，而是积极投身热闹的生活，把个人悲欢融入时代的洪流之中，让个体的讲述获得更多人的共鸣。



这是一场写作变革，大众正在从文艺的“欣赏者”转变为“参与者”。“新大众文艺丛书”的6位写作者，以肉身叩问现实，以文字感受冷暖，既体认自我，也共情他人。这样的书写，让我们看见了平凡中的坚韧意志，也让我们相信，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每一份执着的坚守，都有可能文学里绽放光芒。

谢有顺

■ 书评 《太平春色》： 有关年画的粉色记忆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图

春节贴春联、挂门笺、贴剪纸、赏年画，这些以纸为载体、承载着文化与习俗的艺术品，近年愈显珍贵。春联与门笺尚且有季节性，春节过后就任其在门边褪色，一些制作精细的剪纸与年画，常被加框装裱起来，置于室内，常年欣赏。按照《太平春色：桃花坞木版年画古今谈》作者杜洋和王道所说，古代原版年画现在已经十分罕见，能拥有一幅，也当如珍宝般对待。

我的年画记忆已很模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画便逐渐退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太平春色》记述：受当时部分年画融入封建迷信元素的影响，这一艺术形式进入了一个较为漫长的低迷期。当然，我的这一观感，只限于局部感受，并不代表全部，尽管有“北有杨柳青、南有桃花坞”的说法，但两地辐射区域，年画风格仍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年画在春节市场上的萎缩，

并不代表其文化价值的消失，相反，在批量印刷的春联开始逐渐取代手写的时候，曾经因“印刷”属性被画家们质疑的年画，其“单薄”的载体特性，反而愈发显现出厚重而丰富的承载性与包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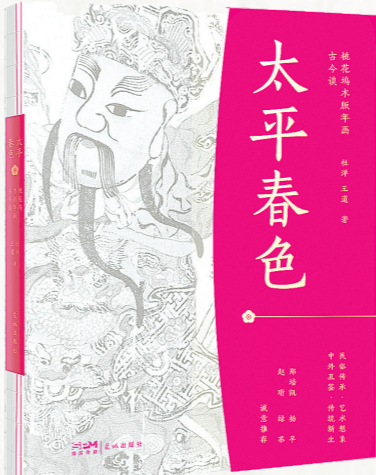
《太平春色》把“桃花坞”这个地名，再次推送到读者视线内。桃花坞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唐代杜荀鹤、宋代范成大等诗人笔下，均有涉及桃花坞的诗作，可考其大致方位。唐代杜荀鹤《桃花河》，宋代范成大《阖门泛槎》等诗作均明确其地理位置。桃花坞有两大特征，一是盛产桃树，桃花盛开时大片粉色如云雾。二是木版年画，受地名影响，“桃花坞木版年画”自带引人遐思的情境，工匠在此制作年画的场景，已成为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如同想到“杨柳青木版年画”会不由自主想到柳叶的飘逸一样，想到“桃花坞木版年画”脑海亦会自动代入粉色。

以粉色为主色调的《太平春色》，书名与内容相呼应，书中收录的大量“桃花坞木版年画”，亦以粉色、深粉、玫瑰红为底色，观之便让人想起那些描绘苏州柔美旖旎的诗句。起源于宋代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见证了苏州的繁荣与繁华，汲取了苏州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优雅与从容，浸润了满满的苏州气质，因而，它不仅是苏州的名片之一，也是管窥江南富足生活的一个窗口。现在阅读《太平春色》，思绪会时常跳出该书对年画的记录与研究，神游

到过去不同年代的苏州与整个南方。

《太平春色》一书的写作与编排，也拥有年画般的细致与疏朗，文理脉络清晰，叙述简洁干净。第一辑《走进桃花坞》，以《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简史》开头，介绍当地年画的源起、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状况，呈现重要的店号与作者，并将年画“起稿、雕版、印刷”的制作全流程和盘托出；第二辑《年画时光几度春》，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年画代表作，以及年画在社会生活不同层面扮演的角色；第三辑《人间丹青话俗年》，重点讲述以年画为核心展开的边缘话题；第四辑《世俗回归与世界视野》，对年画的多重身份做了生动解读。年画既是日常用品，也曾作为贡品入宫，既能走进寻常百姓家，也能成为博物馆的珍藏；第五辑《文学经典里的民俗年画》，对曹雪芹、鲁迅、张爱玲作品中有关年画的内容进行了展开叙述。

《太平春色》既有论著的严谨，又有散文的飘逸，它不仅是对逐渐淡化于公众生活的年画的一次“抢救性书写”，更是借助年画对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情感的怀念与集结。全书还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太平年份，年画作为“春色”一种，是对幸福生活的“上色”与“点缀”，缺少年画的春节，或只是年味稍稍又淡了一点，而如果年画能更多地回归春节以及四季日常，那么人们或可从年画里收获更多艺术上的滋养、生活上的松弛。



韩浩月

《重回盛宴——文学艺术类“中国好书”创作者访谈》： 搭建作家与读者的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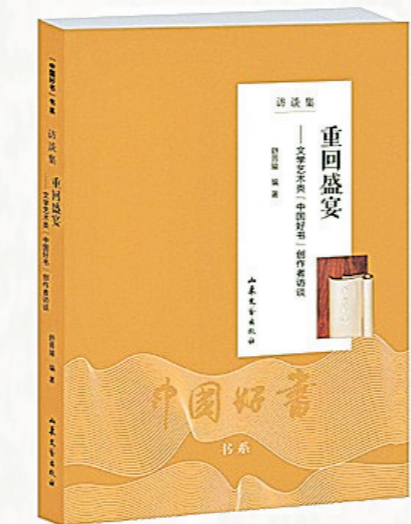
关注中国当代文坛者，对舒晋瑜不会陌生。她的《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风骨：当代学人的追悼与思索》《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冀作家》《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从夹缝到通途：深度对话70后作家》等作品以访谈与对话的形式，呈现着当代文学的深邃与多彩。

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中国好书”评选自启动以来，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已成为全民阅读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品牌。舒晋瑜的《重回盛宴——文学艺术类“中国好书”创作者访谈》，对20余位“中国好书”作者进行了深度访谈，搭建起作家与时代、作品与读者、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

有人称舒晋瑜是“一个带有精神磁场的采访者”，阅读其访谈、对话系列作品，我颇有同感。她不完全是以记者的身份在采访，更多是以研究者的身份介入其中，给予作家高度的理解和同情。因此她的访谈不仅呈现出作家丰富独特的内心世界，也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重回盛宴》的每篇访谈都倾注着作者对时代与文学、作家与生活的解读。比如在

《贾平凹：以作品梳理时代》的访谈中，作者关注到《带灯》的批判很尖锐，表达也比较大胆，遂就此直接发问，而贾平凹的回答也比较直率：“要反映现实的东西，必须写到位，所以我分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抒发精神世界，越虚越好，写得浪漫唯美；一部分是写现实生活，越实越好，都是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一句胡编，写得很实在，另一方面尽量张扬内心世界。现实中的带灯，完全是凭借对文学的爱好和对爱情的向往应对现实中的无奈和痛苦。”

舒晋瑜的“访谈”不止于一问一答，而是建立在她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和对时代的深度思考之上。在问题提出后，层层追问，循循善诱，她总能作作家自然坦露创作的心路历程或经验之谈，从容完成与作家的深度交流，从而满足读者探寻好作品诞生幕后故事的需求。比如在《何建明：我是一名“冲锋的战士”》访谈中，舒晋瑜提出：“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这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也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何建明认同这一观点，回答说：“站在什么立场讲什么故事，是当代作家首先



应该解决的第一课题。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抓住最能反映人心的事件和时代的闪光点。”

舒晋瑜曾说：“访谈是一一次次寻找，用你敏锐和善于捕捉的眼睛去发现、寻找作家埋藏在故事中的技巧和诸多的喻义，一旦进入他们文字的迷宫，有多少耐心的发现，就会收获多少乐趣。”她的访谈、对话是作家的心灵简史，也是时代的文学简史，也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鲜活注脚和宝贵史料。

季栋梁

《绽放》： 一次全新的“绽放”

一次全新的“绽放”

丁捷的报告文学作品以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著称，在题材选择、叙事风格、思想深度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他的新作《绽放》更是将这种特色发挥到了极致。这次他选择了一个更具精神文化内蕴的题材，这使他向来的文化思考、人性分析、哲学阐释的擅长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实现了丁捷报告文学创作中一次全新的“绽放”。

一个肺癌病人，干着身体健康者都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的文明建设、整理发掘地方文化等等，这样的人和事本身就充盈着崇高感和感人力量。报告文学能遇到好的题材固然重要，但作家处理题材的方式和对题材发掘的深度和高度才是决定作品价值意义的决定因素。作品塑造了一位素衣天使的形象，不仅向读者呈现了主人公俞晓冬的善行壮举，更写出了人物如何以美好的灵魂不仅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升华，而且感召他人绽放美的灵光。

丁捷赋予俞晓冬这个艺术形象的价值意义是多重的：俞晓冬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奉献和担当。她到父亲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大别山革命老区去支教，一进山就是十多年，历尽千辛万苦，始终未曾言弃，扎根在那里，倾其余生全部才情和资源，提振乡村素质，改变孩子命运。她背着沉重的乐器进山，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传播才艺，而是希望通过音乐改变孩子们的童年，来普照他们的一生。俞晓冬诠释了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她在无私无尽的奉献中绽放着个人生命的芳华和梦想。

作品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俞晓冬成长的环境和精神成长史，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在她心中洒下了爱的种子，部队环境、军人使命在她爱的心灵中注入信仰的精神内核，她用自己独特对爱的体验、感受和思考来浇灌，让这颗种子在幼小的心田中生根发芽并不断生长。这让他们看到了人物精神源泉背后的生命动力，作品借人物的口说道：“病痛歪歪地走到今天，别人觉得奇怪，我自己不奇怪”“支撑血肉之躯的固然有脊梁，但最有力量的是精气神，一个被爱严实包裹着的人，精气神不会轻易泄光”“生命会始终处于昂扬、美好的状态”。作品还写到，俞晓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群人的支持，有亲人，有同事，有战友，有相识或不相识的爱心人士，作品由此也彰显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程度和社会道德高度。这里面隐含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希望通过俞晓冬的精神成长史唤起人们心中的崇高感和神圣的情感，给时代注入更多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给人们提供一个重新审视自己、欣赏他人，重新认识世界、觉悟生命的维度。

这部作品一个重要的线索，是作者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丁捷提出了一个有关教育的时代之问：“一个人可以怎样被塑造，并塑造得美好，塑造得有价值？”作者从俞晓冬的精神成长史和她的教育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爱的植入，文学艺术的催化，有信仰的奋斗和有价值的成功，使得有限生命行程内可以作出无数的精彩绽放。”俞晓冬将自己的成长体验融入教学中，十多年来在大别山传授艺术，但真正传递出去的，不只是艺术本身，更有爱，有智慧，有更先进的文明方式与理念。她上音乐课不单纯是教音乐，而是以音乐为载体，塑心、育人。她大量阅读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学，践行“美和爱”的教育理念，她以类似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人、环境、情感”三个层面，实践、探讨音乐是怎样与这些元素交互的，音乐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她还尝试实践“跨学科教学法”“情感育人教学

法”等等，在一个物质条件受限、资讯条件受限、生活方式却很单纯的环境中，打造出了一个以纯粹的美学体验、交流和分享为主的音乐课堂。她通过实践和摸索，积累了一个个成功的教育案例，言传身教，通过音乐教育让一个个学生直起身子，焕发出勃勃生机，绽放出美丽的光彩。可以说，“美育”和“爱的教育”的理念和教育实践，是俞晓冬作为教育者形象的两个重要支柱，人们在这个形象身上时时会感受到一种“爱的力量”和“艺术的力量”，这也是俞晓冬这个艺术形象的价值意义之所在。作品的结尾有一段话点题：“有爱付出和轮回，生命就能延续；精神饱满坚定，信仰就能燎原；心中有诗，人生就可以奔赴远方，更可以把远方变成美善智慧的诗意梦想。”我认为，这也是作者对自己教育哲学的一种表白。作者在对一个支教故事所作的发掘和提炼中，植入了他自己对教育所作的深层次思考以及对“美育”和“爱的教育”的独到见解。

当然，这部作品的成功，还取决于作者所采取的对题材的独特处理方式以及对人物故事所做的审美性的呈现。多视角叙事：当事人自述、作者叙述、相关者所见所感所想所言穿插等多重角度合成的叙事，增强了真实感与立体感。叙事、抒情与议论的交织：以情感代入的方式，在完成叙事的同时也在不断解析着精神之间、生命之间、人生之问、人性之问、时代之问。突破传统报告文学的纪实框架：强化叙事的文学性表达，融合小说手法、注入诗意语言、贯穿哲理思考，时有隐喻与象征，借用多门类艺术手段形成诗意美、音乐美、绘画美的艺术效果，成就独特的报告文学文体。

大时代是报告文学兴盛的契机，作为报告文学作家，谁能够把握时代的潮流，谁能够准确把握对时代的社会现实，谁能够精准了解时代的精神状况，谁能够同情理解普遍的情感渴望，谁能够真切感知时代的审美需求，并且能够将这些有高度、有精度、有力度地艺术性地表现出来，谁就能够创作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朱晓进

《航空心理学与人工智能》： 航空领域人机协同的有益探索

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背景下，各行各业积极探索人机协同相关问题。游旭群的新书《航空心理学与人工智能》聚焦航空安全这一高度复杂的技术领域，将航空心理学视野中的“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置于高科技、高风险运行环境的统一框架下进行审视，系统阐释了航空心理学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机制及其对现代航空安全的促进作用，有较强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航空心理学与人工智能》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坚持问题导向，为解决当前航空安全管理领域中的问题提供了方案。例如，飞行员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核心胜任力、心理胜任力、作风胜任力”三维模型，有助于解决困扰飞行员培养的“成本高、周期长”难题。书中提到的航空事故人工智能分析平台，有助于克服以往人因事故“成因分析难”“事故演化机制不清晰”的局限。

在研究内容上，该书体现了构建中国航空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追求。航空心理学是一门研究飞行活动中人的心理行为活动规律的学科。它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面向产业急需而形成的一个新型学科

交叉知识领域。该书结合中国航空安全运行特点与飞行员群体心理特征，提出航空情境中“人类经验直觉+AI计算分析”的双驱动认知模型。同时，在人工智能辅助训练和飞行安全驾驶中融入国内高原机场、复杂气象、复杂空域等运行场景，立足中国现实环境的同时，也为国外同行提供了启发。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创新研究范式，围绕“如何以系统思维整合人-机优势”展开。航空领域的安全保障既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某项“单纯心理”问题，而是“人-机-环-社”多要素动态耦合的系统工程问题。该书探索了如何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安全保障。例如，通过多源数据融合完成对飞行环境、任务状态的精准评估与趋势预判，帮助操作者扩展感知边界，而人类则依据飞行经验、直觉判断等方式完成定性的情景意识计算，补全AI在意图理解、非预期场景应对中的认知空白，共同构成航空领域的认知协同模式。

在成果应用上，该书对AI赋能的多个场景进行了展望。从心理学与智能技术融合出发，该书列举了诸多创新方



案。如在飞行员选拔方面，提出构建多模态数据融合的智能选拔体系，通过结合多维度生理数据，以及虚拟仿真场景下的行为表现，利用多层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技术，精准评估飞行员的认知特质与心理潜能。在飞行员训练方面，主张搭建AI辅助的个性化训练框架，通过赋予AI动态假想敌的角色，实时监测飞行员的训练指标，调整飞行员的训练难度。

《航空心理学与人工智能》不仅为航空领域的人机协同、产业升级提供了心理学解决方案，更在构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林崇德

